

浙江省博物馆典藏大系

ZHE JIANG SHENG BO WU GUAN DIAN CANG DA XI

越地范金

YUE DI FAN JIN



浙江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越地范金 / 浙江省博物馆编. —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9. 11

(浙江省博物馆典藏大系)

ISBN 978-7-80715-491-4

I. 越… II. 浙… III. 文物—考古—浙江省—青铜时代
IV. K872. 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90955 号

浙江省博物馆典藏大系
越地范金

浙江省博物馆 编

出版发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责任编辑 朱艳萍 张 姣 徐晓玲 杨少锋
艺术总监 朱艳萍
美术编辑 刘 欣
激光照排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1/16
印 张 13
版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15-491-4
定 价 188.00 元(平)

浙江省博物馆典藏大系

越地范金

浙江古籍出版社

《浙江省博物馆典藏大系》编辑委员会

顾问：毛昭晰

主任：鲍贤伦

副主任：陶月彪 陈官忠 陈浩

总主编：陈浩

副总主编：李刚 赵雁君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炬	王小红	王屹峰	李刚	杨铿
沈军甫	沈琼华	陈浩	陈官忠	范珮玲
郑幼明	赵幼强	赵雁君	陶月彪	鲍贤伦
蔡琴	蔡小辉	黎毓馨		

《越地范金》

主编：梅丛笑 梁晓艳 黎毓馨

撰文：梁晓艳 梅丛笑 何秋雨

摄影：郑旭明

序

浙江省博物馆创建于1929年，初名“浙江省西湖博物馆”，是中国最早成立的博物馆之一。经过近八十年的发展，如今已成为集收藏、研究、展示、教育和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人文科学博物馆。多个馆区分布于杭州城市中心，包括西子湖畔的孤山馆区、大运河边的武林馆区、老和山旁的文保科研基地、栖霞岭下的黄宾虹纪念室和昭庆寺东的沙孟海旧居等，展示着浙江自古迄今优秀的传统文化，彰显着一种开拓进取、历久弥新的浙江精神。

自建馆以来，经过几代人锲而不舍的努力及社会各界的支持，藏品总数已近十万件。其中，以稻作文化为基础的河姆渡文化的遗物，实证文明起源的良渚文化玉器，“春秋五霸”之一的越国文化遗存，支撑“瓷器之国”的越窑青瓷、龙泉窑青瓷，装点“东南佛国”的五代两宋的佛教文物，以及南宋时期的金银货币，汉代会稽镜，宋代湖州镜，古代漆木器等，不仅具有明显的区域特色，而且还具有颇高的学术价值和文化意义。此外，历代名家书画、玺印，现代革命文物等，也都是影响浙江乃至中国历史，推进文明进程的宝贵遗物。

为发挥藏品的作用，本馆除了在省内举办各种陈列、展览外，还曾在全国各地和德国、日本、新加坡、法国、瑞士、澳大利亚等国家以及我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展出具有浙江特色的文物艺术品，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和兴趣。与此同时，各种反映本馆藏品的专著和图录亦陆续出版，对繁荣文化事业、推动学术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无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陈列展览不仅内容有限，而且难以与人朝夕相伴，既往的出版物又未能全面、系统展示本馆藏品的基本面貌，所以，在信息化的新世纪，我们以图书为载体，将本馆收藏的具有代表性的藏品编辑成《浙江省博物馆典藏大系》十二种出版发行，以冀使更多的人了解浙江的历史与文化，准确地掌握本馆藏品的基本信息，促进展览交流、学术研究、艺术鉴赏，为文明社会的发展作出贡献。

历史文化遗产，是人类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和推动社会发展过程中知识和精神的累积，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作为历史文化遗产重要组成部分的文物艺术品，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蕴涵着无穷无尽的生命力，不仅是逝去时代各种信息的载体，而且对当今社会的进步也具有显而易见的现实意义。展示历史文化遗产，发掘其固有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弘扬和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统，促进文化交流、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浙江省博物馆义不容辞的要务，《浙江省博物馆典藏大系》的出版，意义正在于此。

浙江省博物馆常务副馆长

陈浩

目 录

序/003

综述/006~025

铜器/026~119

商西周时期/028~045

春秋战国时期/046~079

秦汉六朝时期/080~095

唐五代宋时期/096~106

元明清时期/107~119

铜镜/120~203

战国汉六朝时期/122~159

隋唐时期/160~171

五代辽宋金元时期/172~191

明清时期/192~202

图版目录/203~206

后记/207

综 述

铜器

□梁晓艳

青铜器的制造与利用不仅说明人类掌握了复杂精巧的冶炼与铸造技艺，也是人类文明进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距今4000年前，正值西亚青铜文明的鼎盛时期，东亚开始进入青铜时代。虽然学术界对中国青铜文明的起源尚无明确结论，但其规模和特色无疑给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成为中国早期历史最具特征性的物质文化之一。地处中国南方的浙江，青铜文化的发展较北方晚，其整体也不及中原瞩目，但却有自己鲜明的个性，并在一些方面达到了青铜铸造工艺的极致。从浙江省博物馆青铜藏品看，早期的青铜兵器及农具，以及汉代会稽镜与宋代的湖州镜，都是中国历史上具有代表意义的作品。

一

在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青铜器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些小型工具及饰物。及至夏代，体量较大的容器和兵器开始出现，既反映出铸造技术的提升，也表明青铜器进一步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商代是一个更为成熟的青铜文明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古代青铜铸造业的发展进入昌盛期，无论是种类还是数量，都有很大的增长。到商代中期，青铜器上出现了复杂的铭文和精细的花纹。这一发展历程到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达到高峰：青铜器的器形更趋多样化，器身浑厚凝重，铭文更长，花纹也更加繁缛富丽。然而到了西周中期，青铜器在多个方面出现了急遽的变化，除了器壁变得轻薄外，盛行了几百年的动物纹饰也突然退出装饰主纹的领域，装饰风格由神秘奇谲转向朴实无华，简洁和明快成为新的时尚。

先秦时期的浙江属于古越人居住的地区，它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晚于中原，并且受到中原青铜文化的显著影响。较早的良渚文化虽然有史前中国最辉煌的玉文化，但却没有发现任何青铜的迹象。直到距今4000年前的马桥文化，我们才看到一些零星的小型青铜件。它们预示着浙江地区青铜时代的来临。

浙江境内出土的商代至西周的青铜器数量较少，品种也不多，反映出浙江早期青铜业经历过一个缓慢的发展过程。然而，从出土器物的工艺看，虽不能与中原地区相提并论，但依然呈现出不可忽略的进步，并且在形制、纹饰及组合方面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

这一时期本馆馆藏浙江出土的青铜器主要有容器：鼎、觚、盂；乐器：铙、甬钟；兵器：刀、矛、戈；农工具：耜、钁、铤以及一些车马器等。其中的一部分文物源自田野考古发掘，由于具有明确的出土地点，有些还有明确的出土单位，成为我们阐述这一时期浙江青铜铸造业发展特点的主要依据。

馆藏商、西周时期青铜器有明确出土地点的主要有：

1959年在长兴上草楼村附近发现的一件铜簋和一件铜铙^{〔1〕}。铙体呈合瓦状，阔腔，侈铤，舞部有甬与内腔相通。体饰勾连云雷纹。簋（现定名为孟）口沿外卷，最大径在肩部，肩有四耳，圈足，纹饰以单一的“C”形纹为基

本构图单元，以云雷纹衬地，器内底部饰龟纹。出土时铙平躺地下，口朝东，簋倒置在铙内，离地面80厘米左右。这两件器物年代均为西周早期。

1963年在杭州余杭石滩村徐家畈发现的一件铜铙⁽²⁾。该器器形较小，体呈合瓦状，钲部以细线构成的兽面纹为主纹，以联珠纹为地纹，甬部无旋，与内腔不通。年代为商代晚期。

1969年在长兴雉城长兴中学出土的一件铜铙⁽³⁾，形制及纹饰与1959年上草楼村出土的铜铙类似，年代为西周早期。

1976年在安吉三官乡一土墩内出土八件商代铜器⁽⁴⁾，包括鼎、觚、爵、案足等。器物埋藏深度略低于现稻田面。其中的一件铜鼎和一件铜觚藏于我馆。鼎为分裆鼎，三尖锥状足外撇。颈部饰勾连云纹，腹部饰兽面纹，有三扉棱与三足对应。觚体形修长，束腰细颈，大喇叭敞口。器身主纹为兽面纹。高圈足内铸有铭文。

1981年在杭州萧山小东山发现一件青铜甬钟⁽⁵⁾。钟体呈扁椭状，腔体较长，钲、篆、枚间界以突起的规则状小乳丁纹。长甬，下部有旋突起。旋部两面都饰以圆目凸起的细线兽面纹。当为西周中期器。

从这些出土的青铜器看，有些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突出表现在礼器上。如安吉三官乡出土的铜觚、铜爵等，从形制到纹饰，都与中原地区商代铜器相类似⁽⁶⁾；长兴上草楼发现的铜盂，内底饰一大龟纹，其纹饰可以上溯到郑州白家庄出土的兽面纹铜鬲（二里岗期）⁽⁷⁾。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这一时期浙江的青铜器与中原地区的商代青铜器比较，也开始形成自己的特色。反映在器形上，较典型的有铙、甬钟等青铜乐器。

浙江出土的铜铙除了馆藏分别出于余杭和长兴的三件外，另有1976年在金华地区征集到的一件⁽⁸⁾，通高28.5厘米，以细线勾成的兽面纹为主纹，以联珠纹作地纹，甬部无旋，与内腔不通，从器形与纹饰来看，与1963年余杭所出铜铙相类似，时代为商代晚期。1986年，磐安深泽乡农民在山背挖地时发现一件云纹铜铙⁽⁹⁾，残高27厘米，造型和纹饰与长兴出土的两件铙相似，年代应为西周早期。2003年9月温州瓯海区仙岩镇一座西周中晚期的土墩墓中发掘出土一件云纹铜铙⁽¹⁰⁾，器形和纹饰类似于长兴出土的铜铙，墓内同出一件龟纹铜盂。铙和盂组合埋藏的情况尚见于长兴上草楼村，这是一种奇特的组合现象，尚不了解其埋藏意义。2004年3月，安吉高禹镇中学基建工地发现一件铜铙⁽¹¹⁾，铜铙出土于距地表4米多深的一座墓葬，形制与1993年6月湖南省宁乡老粮仓出土的Ⅱ式7号铜铙相似，时代应属西周早期。

铜铙是中国最早的金属乐器之一，主要出土于商周时期的中国南方地区，极具地域特色，是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和江南青铜文化的重要资料。商周时期的铜铙在南方的出土范围很广，以长江流域为主，湖南、江西、湖北、安徽、浙江、广东、广西、福建、江苏九省均有出土⁽¹²⁾，具有明显的南方特色。高至喜先生将这些地区出土的铜铙分为6型17式，概括出由兽面纹铙到简化兽面纹铙、云纹铙、乳钉纹铙、有枚铙，最后发展为甬钟的演化序列，并指出前三类属于商代晚期，后两类属于西周早期⁽¹³⁾。依据高氏的分类，馆藏的余杭石滩铙可归入B型Ⅱ式，时代为商代晚期；长兴铙属D型Ⅱ式，时代应为西周早期⁽¹⁴⁾。

从浙江出土的商代晚期铜铙看，多以云雷纹组成兽面作为主纹，有圆圈纹框边和衬地，甬部无旋。这种样式主要见于长江下游地区，中原未见，与湖南地区所出铜铙也有区别，应是吴越地区特有的乐器。曹锦炎先生认为可以排除由外省传入的可能，他指出，在当时无论从技术上还是从原料上，浙江本地完全可以铸造出这类铜铙⁽¹⁵⁾。

青铜甬钟起始于西周时期，也是一种极富南方特色的乐器。南方出土的甬钟非常丰富，主要集中在湖南的宁乡、长沙、湘潭、株洲、衡阳、湘乡、资兴、临武、浏阳等和江西的新余、萍乡、吉安、清江、靖安、万载、武宁等地⁽¹⁶⁾。高至喜先生认为西周时期甬钟由铙演变而来，并从南方传播至黄河流域，成为两周时期的主要青铜乐器。这种观点得到大多数研究者的认同。馆藏萧山出土的西周铜甬钟，旋部两面都饰以圆目凸出的细线兽面纹，枚篆交界和钲边均以联珠纹作为界栏，36个枚较尖，仅1.8厘米高，具有明显的从铜铙演化而来的痕迹，是甬钟的早期形态⁽¹⁷⁾。本地区同类甬钟还有1974年在鄞县（今宁波鄞州）韩岭出土的西周铜甬钟⁽¹⁸⁾。

除上述器形外，这一时期浙江出土青铜器的地方特色还反映在器物的纹饰上，主要有以下特征：

1. 以联珠纹作为主纹的衬地。联珠纹在中原商代二里岗期就已盛行，但通常用作边缘装饰。在浙江、江苏和湖

北东南部一带出土的这一时期的青铜器，联珠纹成为主纹的衬地，几乎布满全器（铙的钲部）；

2. 以云雷纹组成兽面作为主纹。云雷纹是中原商代青铜器上最常见的纹饰之一，但是以云雷纹组成兽面作为主纹，却只见于江南；

3. 以“C”形纹作为青铜器纹饰。这种“C”形纹饰仅见于长兴及湖南出土大铙的旋部及龟纹铜盂等的腹部，而不见于中原铜器；

4. 纹饰受同期本地印纹陶纹饰影响较大。如1977年长兴长城杨桥发现的铜钺⁽¹⁹⁾，器身满布叶脉纹和细方格纹，这种纹饰未见于中原地区，明显源自本地的印纹硬陶。长兴出土的铜铙、铜盂及安吉出土的铜鼎等铜器上所饰的勾连云雷纹，也与同时期的印纹陶纹饰十分相近，而与中原出土的商周青铜器上的勾连云雷纹不同。

馆藏商、西周时期青铜器中除上述有明确出土地点的外，还有一大批通过捐赠、征集或拨交获得的，其中不乏精品，最著名的有孙诒让旧藏，温州孙氏玉海楼捐赠的西周麦方铜鼎。《籀庾述林》、《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青铜卷》和《中国青铜器》等都著录过该鼎，并做过分析和研究⁽²⁰⁾。麦方鼎长方盘形，铜色黑亮无锈，通体素面无纹。器壁内铸有29字铭文，记载了井（邢）侯对其属吏麦的赏赐，为研究西周时期邢国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和文字资料。还有一批商、西周时期的青铜兵器，包括翘首铜刀、三角援戈、鋡内戈等，虽因出土地点不详而丧失了大量的原始信息，但随着本地区同类出土器物的增多，它们也成为研究这一地区青铜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

二

东周以前的浙江地区被视为落后的“蛮夷”之地，文献古籍中的记载极少。公元前6世纪，夫鐔之子允常拓土称王，越国历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允常之子句践实行“内饰兵政，外事诸侯”的政策。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发展，越国逐渐变得强盛。通过逐鹿中原的争霸战争，越国最终战胜吴国，成为春秋偏霸之一。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浙江的青铜文化不仅有越地原有的基础，而且包含和容纳了原来吴地的青铜文化，呈现出异军突起之势，种类与数量大增，器形和纹饰都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形成了自身的体系和特色，使这一地区的青铜文化进入鼎盛期，并在整个中国青铜文明体系中占有一隅之地。李学勤指出“……事实上，长江下游诸国的青铜文化相当发达。研究金文的学者早就指出，吴、越、徐等国青铜器制作优美，铭文用韵精严，反映着高度的文化水平。过去传统观念以为南方长期在文化上落后于北方，实在是一种误解”⁽²¹⁾。

越国青铜器的发展，与这一地区丰富的矿产资源和发达的冶铸业是分不开的。这一点完全可以从史料记载和考古材料中得到证明。在越都绍兴附近，官营的铜矿开采业与冶炼业在史书上屡有记载。《越绝书·外传记地传》云：“姑中山者，越铜官之山也，越人谓之铜姑渚，长二百五十步，去县二十五里。”又云：“练塘者，句践时采锡为炭，称炭聚，载从炭渚至练塘，各因事名之，去县五十里。”《周礼·考工记》在记载粤（越）地时说，此地“山多金锡”。20世纪的多次地质勘探和考古发掘也证实了浙江确有丰富的铜锡矿藏。如上虞东关境内的银山，历史上曾被称为锡山，相传是越国时期采炼锡的地方。《嘉泰会稽志》记载：“锡山，在县东五十里，旧经云越王采锡于此，旧传山出铅银。”1985年，曾在银山北麓出土了一批斧、铤、镞、剑等青铜器，同时还出土了长宽约40厘米、厚度约6厘米的铅块以及炉渣等。从现存遗址上至今仍到处可以采集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印纹陶片，可以证明当时已有越人在此采矿⁽²²⁾。若耶溪旁的凤凰山发现铜矿，20世纪60年代初已进行开采。凤凰山以西七八里的秦望山，发现铅矿，附近还发现锡矿⁽²³⁾。1959年，绍兴西施山出土了大批青铜工具以及坩锅、炼渣⁽²⁴⁾，证明这是一处越国的冶炼遗址。1963年8月，温州永嘉永临出土了一批青铜残器，并伴出五十多公斤经初步加工过的铜块和少量锡块⁽²⁵⁾，证明这里是一处供冶炼用的废铜料窖藏。1977年，海盐东厨舍村也发现了一批窖藏铜块，盛放在一件印纹陶罐内⁽²⁶⁾。1984年，先后两次在临海上山冯同一地方发现青铜窖藏，内涵与永嘉出土物一样，也以青铜块、破残兵器、生产工具为主，重达数十公斤⁽²⁷⁾。2007年绍兴博物馆征集青铜块20公斤，为2007年上半年西施山迪荡新城基建工地出土。⁽²⁸⁾这些材料都表

明，越国不仅具有丰富的矿产资源，而且有发达的青铜冶铸业。

这一时期的馆藏青铜器数量众多，但多为征集或捐赠所得，只有一小部分通过考古发掘获得。有明确出土地点的主要有：1953年绍兴鉴湖出土的战国时期铜剑，绍兴漓渚铁矿出土的战国时期铜戈等。1965年萧山尖山镇出土的战国时期铜斧。1969年在江山江坝村出土的一组六件春秋时期铜编钟⁽²⁹⁾（1971年在原编钟出土地点又找到一块铜残片，鉴定为钟的铣部，分析排比后认为当在之前出土的青铜编钟的1、2号钟之间，因此，该套编钟原应为七件。）1969年吴兴（今湖州）埭溪出土的一件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铜鸕杖杖徽⁽³⁰⁾。同年在长兴李家巷出土的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蟠虺纹青铜鼎⁽³¹⁾。1971年余杭仇山出土战国时期的铜凿。1971年嵊县（今嵊州）三合出土的战国锯齿铜镰。1977年在绍兴亭山发现的两件有铭文的铜钩鐙（后调查得知出于绍兴城关狗头山西南麓。沙孟海考证其为“配儿钩鐙”，属春秋晚期的吴器）⁽³²⁾。1982年在绍兴坡塘306号墓出土的一批精美的青铜器⁽³³⁾。此外，在杭州西湖疏浚时也出土了战国时期的铜锛、铜铲、铜矛等小件青铜器。在湖州苕溪旌儿港则出土了战国时期的铜剑等。

这一时期馆藏青铜器按器类可分为：容器：鼎、鬲、甗、盂、尊、缶、卣和等；乐器：钩鐙、编钟等；生活用器：带钩、镇、勺等；农业生产工具：耨、锄、铲、犁沟器、犁铧、破土器、锛、镰、铎等；手工业生产工具：斤、凿、镑、斧、削刀等；渔猎工具：鱼钩等；兵器：戈、铍、矛、钺、剑、矢镞等。其他特殊器有插座和伎乐铜屋等。

绍兴坡塘306号墓出土的青铜器是这一时期馆藏青铜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1982年3月，浙江省考古工作者在绍兴市坡塘狮子山发掘一座东周时期的墓葬。该墓属阶梯墓道带壁龛的土坑墓，出土了上千件随葬品，其中包括17件精美的青铜器：鼎四件，甗一件，甗盂一件，钺盂一件，罍一件，鉴一件，炉一件，尊一件，铜质房屋模型一件，插座一件，小铜豆一件，小铜壶一件，小阳燧一件，铜洗一件。另有铜质工具如刻刀、削、刀、凿等42件。

墓中出土的部分青铜器明显带有淮河流域徐国和舒国的文化风格，如汤鼎和铜罍，从形制到装饰风格和主体纹饰都具徐地特色。铜甗盂器形特别，不见于浙江其他地区，同类器多发现于安徽地区，如安徽舒城县凤凰嘴春秋墓、舒城县河口镇春秋墓、怀宁县人形河春秋墓、六安市走马岗春秋墓、河南光山县宝相寺春秋时期的黄君孟夫妇墓等均有出土⁽³⁴⁾。另外，湖南衡南县胡家港春秋墓也出土有此类器物⁽³⁵⁾。306号墓出土的青铜器上也能看到楚文化的强烈影响，如墓中出土的铜插座，同类器物不见于浙江地区，而在楚文化区域内却是习见。此外墓中出土的青铜器也具有明显的越地特色，如伎乐铜屋中乐俑的发髻应是本地发式⁽³⁶⁾，铜屋所有纹饰都是越式的，铜尊的纹饰也完全是越式的⁽³⁷⁾。铜插座座体上的龙凤纹也与本馆征集的传出自绍兴的一组铜镇上的纹饰如出一辙，跪俑身上奇谲的纹饰，与绍兴出土的春秋时期铜鸕杖⁽³⁸⁾和湖州埭溪出土的铜鸕杖杖徽上的跪俑纹饰相似，可能是越人文身形象在器物上的反映。

针对此次发现，学术界展开了争论，曹锦炎、林华东、牟永抗、钟遐、刘广和、董楚平等分别著文对墓的性质及器物形制、铭文进行了考证，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³⁹⁾。

这一时期馆藏青铜器中的部分青铜容器富有区域特征，主要体现在鼎、尊等器形上。

馆藏铜鼎中有一种鼎形制特别，三足细高外撇，装饰纹样简洁，仅在腹部施几道细弦纹。这种鼎被称作“越式鼎”。这一概念最早在1980年由俞伟超先生提出，认为其特征是“腹深、盖薄、附耳、三足瘦细外撇，盖上往往还饰双线云雷纹，表面看来似乎是一种早期花纹，实际上是南方百越地区极为发达的那种几何形花纹”⁽⁴⁰⁾。越式鼎一般容积较小，外观也不厚实强壮，三足做外撇状，给人以稳定感。它的分布面与南方几何印纹陶的分布面大体重合，考虑到这一区域正是百越杂处之地，应属古越人特有的器种。越式鼎出现在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的时间都在春秋以后，而在长江下游地区则早至西周中期⁽⁴¹⁾，因此这一带可能是这类鼎的发源地。

铜尊在中原地区于西周晚期消失，到了春秋晚期在淮河以南和江南又重新出现。浙江出土的铜尊腹部突出成丰满的圆弧状或相当突出的扁球形，尊颈和腹部的纹饰独具地区的特色。此外较有特色的铜器还有鸕杖和铜镇等。

在器物的装饰纹样上，这一时期越地青铜器上流行的纹饰有的模仿中原的纹样，有的在模仿的基础上做了大的变动，改变了中原纹样的正常比例和形状，更多的则是有着吴越地域和时代特色的纹样，包括交连纹（线条为横向钩形分歧，单位纹饰上下交连，单位之间有界栏，或简单或复杂，为中原和其他地区所未见）；棘刺纹（在小方格内，

以横直线条为地纹，每一方格内有一枚具有一定长度的青铜刺，细如针尖，整体看是密集丛生；方格纹（似方形或长方形格子状，纹用多条较长的横竖单线条，外加较短的小曲线组成，线条细如毛发，纹样似网格）；编织纹（用多条平行的横线和竖线组成，有的加饰其他纹样）；锯齿纹（像锯齿似的排列成带状，通常是上边的锯齿尖向下，下边的锯齿尖向上，相互对应，多用作界栏，饰在主纹上下或器颈与足上）和折线纹（将一条较短的直线经过正常折或再折，变成矩形或重叠的人字形纹样），等等。

青铜生产工具的大量铸造和使用是浙江地区春秋战国时期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周礼·考工记》在记载粤（越）地时曾说，此地“山多金锡，铸冶之业，田器尤多”。“粤之无镈也，非无镈也，夫人而能为镈也。”郑玄注云：“言其丈夫人人皆能作是器，不须置国工。”反映了工匠技艺具有普遍而广泛的社会基础。这一文化现象的出现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息息相关。句践时期，正是群雄争霸，战争频仍的时代，出于部族生存及对吴战争的需要，句践倾全国之力发展农业经济。为了适应垦殖与拓荒的需要，越人将珍贵的青铜用于制造各种生产工具和农具。这些青铜农、工具的大量制造使用，为越国开发山会沼泽平原、兴修水利，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并使越人的耕作技术出现了质的飞跃。从越地出土器物 and 馆藏器物来看，这一时期的生产工具涵盖了农业、手工业、渔猎等各个生产领域，其数量之众多和门类之齐全，都是中原地区所无法相比的。这些农具按其用途可分为起土、除草、收割三大类，大致反映出越国农业“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生产程序和“精耕细作”生产方式的基本面貌。这些农具在器形、种类和地域分布方面都表现出鲜明的越文化特色，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刃部带有锯齿的农具，包括锯齿铜镰和锯齿铜耨等。这些刃部制成锯齿状的农耕工具在当时无疑是较先进的生产工具，它们的使用提高了越人垦拓、收割和加工稻谷的能力，为越国的经济繁荣和国势强盛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青铜兵器在越国的青铜文化中也占有突出的地位。频繁战争促使越国倾全力于军备，越国兵器铸造业因此得到了迅猛发展。兵器在越国遗存的青铜器中是个数量众多的大类。当时常用的青铜兵器有剑、矛、戈、戟、钺、铍、箭镞等等。青铜剑可以说是浙江青铜文化最突出的代表。浙江地处平原水网地带，车战难以展开，战争依赖步兵方阵，兵器主要用剑。在车战逐渐衰弱的时期剑还极大地影响了北方军队，成为战国晚期战争的主要兵器。在社会需求的推动下，越地的铸剑技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周礼·考工记》载：“吴粤（越）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庄子·刻意》也说：“夫干（吴）越之剑者，柙而藏之，不能用也，宝之至也。”相传著名的欧冶子为越王句践铸成湛卢、纯钩、胜邪、鱼肠、巨阙等五柄宝剑，干将、莫邪在德清莫干山铸成稀世名剑的故事也在民间广泛流传。出土和存世的越国铜剑证实了越国精湛的铸剑技艺。这种铸造技艺具体表现在剑身、茎、格、箍、首的成形技术，剑身的磨削技术，复合剑的制作技术，铭文的成形和错金技术，剑格和剑箍的镶宝石、镶琉璃技术，剑身菱形暗格纹等异光花纹形成技术以及剑鞘制作技术等方面，其中最令世人赞叹的是剑身菱形暗格纹技术、复合剑技术和剑首同心圆技术，这三大技术一直困扰着研究者，直到近几年，上海博物馆的研究人员才成功破解了这些技术难题^{〔42〕}，重现了越人铸剑的精绝技艺。本馆馆藏铜剑有十余柄，其中最为著名的有：1995年底从香港征得的越王者旨於赐剑，这是越王句践之子鼫与（“者旨於赐”是越语对汉字“鼫与”发音的缓读形式）的自作用剑，也是目前发现的越王者旨於赐剑中保存最为完好的一把。此剑剑体宽阔，中脊起线。圆盘形剑首，圆茎上有两凸箍，箍饰变形兽面纹，茎绕丝质缠缚。剑格两面铸双钩鸟虫书铭文，正面为：戊（越）王戊（越）王；反面为：者旨於赐。字口间镶嵌着薄如蝉翼的绿松石。此剑附有完整的剑鞘，系用两块薄木片粘合而成，外用丝线缠缚加固，再髹以黑漆。在出土或传世的吴、越剑中可谓绝无仅有，实为剑中极品。2002年本馆征集的一柄越王州句剑也是一件难得的珍品。这是句践的曾孙州句的自作用剑。剑长57厘米，作斜宽从厚格式，中脊起线，两从斜弧，双刃呈弧形于近锋处收狭。剑身满饰交织的波状暗纹。近格处错“戊（越）王州句自作用剑”八字鸟篆铭文。剑出土时附完整的鞘与匣，漆黑的鞘上有朱绘神人操蛇图，色泽鲜艳，宛如新出。此剑为研究越人习俗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2007年本馆还征集了一柄春秋时期的青铜复合剑。该铜剑采用了复合铸造技术，剑之中脊及两从用不同成分的青铜嵌铸而成。中脊含锡量较低，故硬度低而韧性强，使剑不易折断；两从含锡量较高，故硬度高，可提高杀伤力。复合铸造技术体现了古代匠师对铜剑合金成分比例

首作装饰。两汉时代的酒樽，多作圆形，直壁或圆形鼓腹，下均有三矮足，有的在腹壁有二铺首。而两晋时期的酒樽有的则做成长筒形、平底、下有三矮足等等。这一时期的青铜器装饰纹样上以素面为主，外表较粗糙，仅小部分青铜器具有简单的弦纹，铜洗中饰有鱼纹。少数制品有鎏金。

四

隋唐时期，铜器的地位进一步下降，这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宗教信仰等息息相关。东汉以后中原地区战乱不息，北方游牧民族纷纷进入中原，在促进民族融合的过程中，也使得传统文化发生了深刻的改变。因此，与商周、西汉时期不同，隋唐时期用铜制作礼器的做法已经少见。同时，社会经济结构的改变，也使铜器的地位进一步下降。这一时期瓷器的烧制技术已完全成熟，其适用性可以和铜器相媲美，甚至在某些方面显得更加精美豪华。随着精美的瓷器被大量生产出来，全国上下均改用瓷器，整个社会不再重视铜器制作，而将热情投入到瓷器烧制中，从而使得铜器制造业渐趋没落。

然而，在另一方面，随着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对钱币的需求量大大超过前代，大量的铜被用于制作钱币。玄宗开元中，“天下铸钱七十余炉”⁽⁵⁴⁾，“天宝中，诸州凡置九十九炉铸钱”⁽⁵⁵⁾，这种将大量的铜料用于铸钱的现象对冶铜造器造成了重大影响。此外，佛教的兴盛也使得大量的铜料被用于佛教造像和礼佛用器的生产。佛教寺院开始成为用铜的重要场所。因此，这一时期除铜镜、钱币、佛教造像、礼佛用器外，礼器和日常生活所用铜制品在考古发掘或传世品中不多见。不过用铜制作礼器在唐代并未完全绝迹。《旧唐书》载：“铸铜为九州鼎……司农卿宗晋卿为九鼎使，都用铜五十六万七千一百一十二斤。”⁽⁵⁶⁾

馆藏隋唐时期铜器多为佛教造像、铜钱和铜镜，铜生活用器极少。馆藏精品中有一件唐开元八年（720）铜钟⁽⁵⁷⁾，1953年发现于鄞县（今宁波鄞州）七里乡。这是一件礼佛用的小型梵钟，通高37.5厘米，腹围64厘米。钟体作圆筒形，上部略收缩，口沿平直。器顶部为一两端饰龙首的蒲牢。钟体中部偏下铸出两个饰有莲瓣纹的撞座，以撞座为中心用凸起的阳线隔成十字形方格纹，十字形线之外的空间再用短横线加以分割。器身上有大唐开元八年纪年及制造人姓名。孙机先生曾对中国梵钟做过系统的研究，认为这件开元八年钟是Ⅰ式梵钟中最早的一例，这种样式主要流行于长江以南，自南北朝以迄明、清，历代相沿不绝，并对日本产生了较大的影响⁽⁵⁸⁾。同类的钟还见于诸暨出土的广德元年（763）铜钟⁽⁵⁹⁾，尺寸和造型与馆藏开元八年钟类似。这两件钟都是Ⅰ式梵钟中的代表之作。出土于西湖的五代时期鎏金铜龙也是馆藏的精品之一。铜龙作站立状，龙首昂起，龙口大张，双目炯炯有神。铜龙用于道教举行的斋醮仪式中。唐五代和宋代，帝王经常举行“投简”仪式，向洞府名山散投简册，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小铜龙充当通神使者。

两宋时期的铜器铸造业，无论是冶铜技术还是铜的产量，都有一定的发展。铜制品的种类主要有货币、铜镜以及铜造像等等。这一时期青铜文化中的重要内容是“再现三代”的仿古青铜器的大量出现。关于这一运动的起因，陈芳妹在《宋古器学的兴起与宋仿古铜器》一文中解释道：“宋仿古铜器的出现，事实上主要来自朝廷宗庙祭仪的需求。换言之，皇帝成为仿古铜器的最大赞助者。”⁽⁶⁰⁾宋宫廷曾据内府所藏商周青铜礼乐器大量仿造青铜器，以为郊庙之用。特别是宋徽宗在位时期，三代铜器被大量收藏，宣和年间，宫室收藏文物数以万计，当时保和殿左右有稽古、尚古、博古阁藏上古三代遗物。仿古铜器也被大量制作，为此还设立了专门的礼器局生产仿古铜器。正是出于复制或仿制古铜器的需要，宋代金石学也获得长足的发展。

宋代仿制青铜器的水平较高，器形上可以模仿得惟妙惟肖，但神韵不足，不具备商周时期青铜器所具有的雄伟、朴实、浑厚的气韵。仿制的花纹或过粗或过细，不如商周时期的花纹协调。

本馆藏有一批宋仿青铜器，其中以20世纪80年代于杭州环城西路和武林门外城墙下出土的仿古铜器最为精美。这批铜器数量较多，器形有爵、尊、方鼎、贯耳铜壶、蒜头壶等。铜爵深腹，卵形底。双柱，菌状（或称伞形）柱帽。

三足外撇程度较大，断面呈三棱形。腹饰兽面纹。形制和纹饰具有商代晚期阶段青铜爵的特征。铜尊属三段式筒状尊。广口，鼓腹，圈足。通体饰花纹，口沿下饰变形蝉纹，颈部为垂首弓身小蚕纹，腹部和圈足饰兽面纹。器形、纹饰与故宫博物院藏北宋宣和三年（1121）山尊极为相似，很可能是以宣和山尊为母本制作的。蒜头壶，小口，长颈，圆腹，头部呈蒜头状，肩部附两个铺首衔环。壶头呈蒜头状是秦汉器物的特征，这是仿秦汉风格的器物造型。

五

宋代仿古之风延续至元、明、清时期。元代时诏修诸路府州邑县之庙宇以供春秋祭祀。《元史·祭祀志》中记载元成宗时为此设置出蜡局，来仿造各种古祭器。但因元代延续时间较短，朝廷只重视用武力四处征讨，而不重视文化建设，所以仿制的铜器大多草率模铸，质量低劣，几乎没有重要的铜器生产出来。当时最著名的匠师是杭州的姜娘子和平江路的王吉。明高濂《遵生八笺》载：“元时，杭城有姜娘子和平江的王吉二家铸法，名擅当时。”其中姜娘子所铸古器花纹较细，胜于王吉所为，“其拨蜡亦精，炼铜亦净，纹片精美，制度可观，不让古代，可入上赏”。馆藏元代青铜器中有一件铜方炉，正是姜娘子所铸。这件铜炉整体方形，四壁及底部饰云雷纹，两侧各有一铺首衔环耳，底部铸款。制作较精。

馆藏元代青铜器中最多见的是作为计量用具的铜权。权身多作六面体，亦有作圆形的，有呈叠涩式的底座，顶上有元宝形或倒梯形钮。元代的权衡器由官方制造，凡改元必另铸新权，从元世祖立国之前的中统到元末的至正，几乎每改一次年号，都有铜权遗存至今。元权刻铭除记年号外，多另加刻路、府、州等各级监铸权衡器的官府名称，反映了元代权衡器的管理措施。元权的大量制造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和经济文化的交流有关。元朝统治时期，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声誉远及欧亚非三洲。元代的商业，特别是海外贸易得到较大的发展。当时海上交通有广州、泉州、上海、杭州、温州等重要通商口岸，与日本、朝鲜、印度以及波斯湾沿岸各地都有贸易往来。

明代铜器铸造生产有所恢复。宣德年间，宣宗因见郊坛宗庙及内廷所陈设之鼎彝均非古制，遂生复古之心，于宣德三年（1428）敕谕工部自宋人《宣和博古图》、《元丰礼器图》等图谱中选取88种，又从宫内所藏宋代柴、汝、官、哥、定等窑瓷器中选出样式典雅者29种，共计117种，经御定后由工部依原器之大小、花纹、颜色精心仿造。这些鼎彝后世所见以炉为多，被称为“宣德炉”。宣德炉在古玩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精美佳妙程度可以说是空前绝后。这种炉在当时就很受世人的重视，一直影响到清代以至民国，仿制品很多。

清代铜器继承了明代的传统，铜器的类型应有尽有。清代宫廷内专门设立“造办处”来仿造古代各种彝器，以为内廷陈设、佛堂供奉、太庙郊坛等使用。尤以乾隆朝宫廷仿古器最盛。馆藏清代铜器中有一批同治九年（1870）杭州府学祭祀用器和光绪二十八年（1902）余杭塘栖朱氏祠堂祭器，器形有豆、敦、鬲、簋、铏、尊等，均有铭文，铸明了制作年代、人物以及用途，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馆藏同治九年杭州府学祭器的铸造主要与太平天国对杭州的破坏有关。太平天国对儒学采取排斥态度，因此对弘扬儒学的场所——官学和书院毫不顾惜地加以破坏。清代杭州有三所官学：杭州府学、钱塘县学和仁和县学，还有四所书院：敷文书院、崇义书院、紫阳书院和诂经精舍，在庚辛之役（太平天国军队攻克杭州的咸丰十年为庚申年，十一年为辛酉年）中都遭到了极严重的破坏。战乱结束后，官府重治祭器，考订礼器乐器，使祭孔之仪得以举行。这一时期的祭器，多仿自商周时期的青铜礼器，但只是器形相近，纹饰却不太一样，制作也很粗糙、草率。馆藏清代铜器中还有一批仿明代的宣德炉，数量较多，器形各异，大部分器物底部铸有“大明宣德年制”款，质量高低不一。

铜镜

□梅丛笑

在“礼崩乐坏”、传统的青铜礼器行将就木之际，古代青铜镜却以其绚丽多姿的纹饰、精致轻巧的形态，延承青铜礼器发展的余脉，再次达到了青铜工艺的高峰。铜镜是古人梳妆照容的生活用品，与威严神秘、颇具“狞厉之美”的商彝周鼎相比，小巧玲珑、纹饰绚丽的铜镜更显出礼教衰弛和崇尚人间享乐的世风嬗递，散发着温馨的生活气息。铜镜又是中国青铜器中自成体系、价值极高的精美工艺品，它铸制精良，形态美观，图纹华丽，铭文丰富，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瑰宝。

浙江省博物馆收藏铜镜共计600余面，上起战国，下迄清代，各重要历史时期的铜镜均有收藏。馆藏铜镜基本反映了浙江出土铜镜的状况和浙江铜镜的发展历史，它与中国铜镜发展的轨迹基本一致。馆藏铜镜以铭文丰富、纹饰精美的汉镜，富丽堂皇、活泼写实的唐镜和轻薄纤秀的宋镜为主，其中会稽镜和湖州镜以其特有的江南地域风格独树一帜，在中国铜镜史上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一页。

本图录遴选各个历史时期的铜镜130多面，基本反映了馆藏铜镜的面貌。图录以历史时代为序，分战国汉六朝、隋唐、五代辽宋金元和明清四大部分，展现馆藏各历史时期铜镜的主要类型和发展脉络。

一

浙江何时开始使用铜镜目前尚难断言。除安吉发现一面山字镜、绍兴出土数面透雕复合蟠螭纹镜外⁽¹⁾，浙江境内几乎没有发现先秦时期的铜镜。这表明：先秦时期，传入浙江的铜镜数量极少，居住本地的越人基本没有使用铜镜的现象，这应与越人不使用铜镜的文化习俗有关⁽²⁾。同时，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争霸，战争频繁，迫使越国大力发展青铜兵器和青铜农具生产，因此人力、物力有限，不能大量铸造铜镜等日用器物。这可能是浙江地区未大量发现先秦铜镜的根本原因⁽³⁾。

浙江地区的铜镜大约从西汉开始较广泛地流行。西汉初期，浙江还是地广人稀、火耕水耨之地，由于大规模的治水屯田和北方人民大量南迁，江南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南迁的北人带来了中原的文化，同时带来了铜镜及其生产技术。至此，浙江开始有了大量铸造铜镜等日用器物的需要和条件。

从浙江各地发现的铜镜来看，境内汉代各时段的铜镜都有出土。西汉早中期以蟠螭纹镜和草叶纹镜最具代表性。西汉中叶以后昭明镜、日光镜和四乳四虺镜比较多，东汉时期禽兽博局纹镜、多乳禽兽带镜更多。这些源于北方的镜式出现于浙江，反映了汉代大一统的政治文化背景下铜镜使用的共性，但有些镜种大量地出现于浙江，就很难说都是外地流入的，可能一部分是在当地生产的⁽⁴⁾。

蟠螭纹镜是西汉早中期铜镜中最具有代表性的镜种，也是浙江省博物馆藏铜镜中较早的铜镜类型之一。西汉蟠螭纹镜是在战国时期同类镜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保留了战国蟠螭纹镜的许多特征，同时又采用了双线或三线式新的主纹表现手法。蟠螭纹镜在西汉早期十分流行，使用区域广，出土数量较多。陕西、湖南、湖北、山东、河南、河北、江苏、广东等西汉墓中均有出土。浙江省博物馆收藏的博局式蟠螭纹镜与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之妻窦绾墓出土的一面蟠螭纹镜相似⁽⁵⁾。

草叶纹镜是浙江省博物馆藏铜镜中另一较早的铜镜类型，流行于西汉早期和中期，是汉代流行的主要镜种之一。草叶纹镜花纹以镜钮为中心，采用四分法，对称布局。主题纹饰已从神秘的虚幻世界转向清新世俗的现实世界，其寓意显然和汉代时尚的审美情趣及社会文化背景密切相关，人们从崇尚神仙鬼怪的幻想中脱离出来，真正开始领悟来自生产生活带来的乐趣，与此相应，铜镜纹饰也从繁缛神秘的蟠螭纹走向大自然的草叶花纹。

蟠螭纹镜和草叶纹镜都是汉武帝时期流行的新样式，诸如祈求富贵、大乐铭文的出现，博局纹、云气纹、草叶纹成为主纹，镜的边缘用连弧等等，几乎是西汉中期到新莽乃至东汉早期青铜镜纹饰的主要特征，汉武帝时期出现的新格局揭开了汉代铜镜发展的全新历史。

浙江出土的西汉中期以后铜镜主要有星云镜、日光镜、昭明镜、四乳四虺镜、四乳四神镜等。浙江省博物馆藏汉镜中，除星云纹镜外，其他种类的铜镜基本都有收藏。星云纹镜主题纹饰为数目不等的小乳钉，用曲线相连，其形状很像天文星象图。从整体来看，星云纹镜制作比较精良，镜体相对厚重，保存状况良好。星云纹镜在河南洛阳烧沟一期汉墓出土四面，同出的有武帝和昭帝五铢钱⁽⁶⁾。北京大葆台西汉木椁墓亦出土一面，同出的一件残漆器上有针刻铭文“廿四年五月丙辰丞”，被认为是燕王刘旦在位的廿四年，相当于汉武帝太始三年（前94）⁽⁷⁾。江苏扬州邗江胡场汉墓出土的星云纹镜与宣帝五铢同出⁽⁸⁾。可见，星云纹镜主要流行于西汉中期武帝、昭帝、宣帝时期。由于流行时间较短，南方地区出土相对较少，浙江仅在西汉中期墓中有少量出土⁽⁹⁾。

日光镜是汉镜中出土数量最多、流行范围最广的镜类之一，我国许多地区都有发现，以陕西、河南、河北、山西等北方地区出土最多，湖南、湖北、浙江、广东等南方地区出土相对较少，南北地区出现较大差异。此类镜铭文常为“见日之光，天下大明”，字间各有小菱形格或の纹。字为规整挺拔的篆体字或介于篆隶之间的字体，具有类似篆刻的效果。据《烧沟汉墓》报道，凡出日光镜的汉墓都出昭帝宣帝以后的五铢⁽¹⁰⁾。广州汉墓的中期和晚期墓中，也各出一面日光镜。陕西西安汉墓中出土的日光镜则进一步说明，日光镜出现于武帝初年，流行于西汉中、晚期及王莽时期，个别可能晚到东汉早期，东汉中期以后消失⁽¹¹⁾。浙江发现的日光镜，大部分出于西汉中、晚期墓葬⁽¹²⁾。

昭明镜通常称为内清镜。此类镜是出土数量最多、流行范围最广的镜类。昭明镜与星云纹镜在北京大葆台汉武帝太始三年墓同出，其流行时代与日光镜基本相同，即西汉中后期，以后期最盛，东汉早期以后消失。昭明镜镜铭为“内清质以昭明，光辉象夫日月，心忽扬而愿忠，然雍塞而不泄。”但镜铭常有缺字失句现象。镜铭字体在西汉中期以变篆体常见，但隶化已相当明显。西汉晚期、新莽时期流行篆隶式变体，镜铭中多加“而”字。字体方正的“而”字镜从宣元时期开始出现，流行于西汉晚期、新莽时期，东汉早期以后消失⁽¹³⁾。

四乳四虺镜又称四乳四螭镜。主纹分为四组，每组有双钩云纹虺贯穿其间，虺身腹背两侧饰不同的纹饰，以禽鸟居多。有的配以青龙、白虎、朱雀或怪兽等禽兽头图像。四乳四虺镜与昭明镜、星云纹镜在北京大葆台汉墓同出⁽¹⁴⁾。

《烧沟汉墓》报道：部分四乳四虺镜与日光、昭明镜同出，配有兽头图像的镜则与规矩镜及东汉五铢同出。可见，四乳四虺镜流行的年代应从汉武帝一直延续到东汉早期。浙江的四乳四虺镜均出自西汉晚期和东汉早期墓⁽¹⁵⁾。

博局纹镜是汉代最流行的镜种之一，流行区域广，出土数量大。主要有四神博局纹镜、鸟兽博局纹镜、几何博局纹镜、简化博局纹镜等类型。

博局纹是汉代铜镜中较多见的一种纹饰，在蟠螭纹镜中第一次出现。过去国内和日本学者称之为“规矩纹”，欧美学者则习称“TLV纹”。近年来一些学者经过考证认定，此镜纹来源于六博棋局上的纹饰。首先，铜镜上12个曲道的排列组合是固定的、有规律的，与博局的曲道相同，如果把铜镜图案叠放在博局图案之上，则两种图案吻合⁽¹⁶⁾。其次，从博局纹铜镜的产生、发展和消失的过程来看，又是和博戏的存在、发展以及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博局纹铜镜约产生于秦汉之际，全盛于西汉，消失于两晋南北朝之间。也就是说，它诞生于博戏盛行之时，消失于博戏衰落之日⁽¹⁷⁾。再次，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的四神规矩纹镜的铭文中出现了“刻具博局去不羊”的词句，则是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¹⁸⁾。“六博”这种棋艺，春秋时期就已经出现，至汉代博戏盛行，老幼皆知。《西京杂记》卷下《陆博术》：“许博昌，安陵人也，善陆博，窦婴好之，常与居处。其术曰：‘方畔揭道张，张畔揭道方；张究屈玄高，高玄屈究张’，三辅儿童皆诵之。”博具还常被用作嫁妆和随葬品，甚至人们在举行祭祀时，也张设博局。《汉书·五行志》：哀帝建平四年（前3）“京师郡国民聚会里巷仞佰，设张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可见“六博”已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将“博局”纹饰用在铜镜上面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神博局纹镜是新莽前后出现的一个新镜种。镜背博局纹截成的界格内，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各据一方，并